

《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



罗源文 梵 杨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全体成员

目 录

开幕词	郑伯农(1)
《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斯奋(3)
《一代风流》与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	陈 涌(5)
革命是清除个人主义污垢的洗涤剂 ——谈谈何守礼和张纪文两个艺术典型的时代 意义	程代熙(23)
周炳 胡杏 一代风流	杨 柄(30)
风云世纪风流人 ——《一代风流》读后感	涂 途(42)
独特与类同	徐非光(56)
艰难的磨砺 ——评何守礼形象的典型意义	田海蓝(59)
谈谈周炳入党前的性格塑造	陈敏才(72)
笔耕矢志为人民	舜 之(82)
再论胡杏	罗源文(90)
气质·风度·美及其他 ——论欧阳山《一代风流》中的周炳	李天平(103)
略论《一代风流》的大众化美学特征	郭正元(117)
坚定的目标 执著的追求 ——论《一代风流》典型塑造的成就	谭志国(128)

高品位的鸿篇巨制	
——论欧阳山的《一代风流》	赵士聪(141)
美的造型	
——论区桃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吴锡河(151)
从《一代风流》看欧阳山的人物形象塑造	
观	邝邦洪(162)
独特的南国都市风云图	
——重读《三家巷》	黄树红(169)
一种穿透历史的艺术思辩力	
——浅资欧阳山艺术典型观	伍志红(180)
结构、风情描写和语言特色	李慧云(184)
苦难中磨砺 逆境中成长	
——对胡杏典型性格的解读	施汝香(194)
一部完整的史诗式作品	梵 杨(201)

贺信·贺词·贺电

贺信	翟泰丰(210)
贺信	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211)
贺信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212)
贺信	林默涵 魏巍 张常海暨 《中流》杂志社全体同志(215)
贺词	刘白羽(216)
贺电	李尔重(217)
贺信	周而复(218)
贺信	黎 辛(221)

贺信	何启治(224)
贺电	易准 梁惠卿(225)
贺诗	常 海(226)
贺诗	郑伯农(227)
塑造典型人物是衡量小说得失的重要标尺	
——欧阳山《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	
纪要	陈 衡(228)
在“欧阳山《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结束时	
的讲话	欧阳山(236)
青松云山立	
——欧阳山《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	
侧记	朱 琛(240)
《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纪要	
	(244)
欧阳山年谱	燕绍明 辑(245)

开 幕 词

郑 伯 农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联合举办的“欧阳山《一代风流》典型性格座谈会”现在开幕了。我代表主办单位，向参加座谈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向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两天前，欧阳老刚刚度过了八十七岁生日；今年，又是欧阳老从事文学创作的七十一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举行《一代风流》典型性格座谈会，大家一定会感到分外亲切。

同志们、朋友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中，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塑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时期以来，许多同志强调文学是人学。问题不仅在于承认文学是人学，还在于对人作什么样的理解。有人问，文学到底是写人，还是写社会？我以为，把写人和写社会割裂开来，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不写人，则无以体现社会；不写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则无以体现人。只写人的生理属性，抛开人的社会属性，就不可能表现人的本质特征。文学既是人学，也是社会学。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文学家是社会的书记。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审美、形象的反映，这种反映不同于简单的照相和录音。文学创作的方法、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而

“典型化”，则是一条普遍的创作规律。古今中外的小说名篇，哪一部没有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哪一部不是给人物画廊增添新的光彩？诗歌、散文等，不一定都去塑造具体的人物形象，但也要表现典型环境、典型情绪。恩格斯提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毛泽东要求作家把自然状态的社会生活典型化；邓小平号召作家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些理论现在没有过时，将来也不会过时。只要文学存在一天，典型形象的创造就不可避免地是艺术创造的中心课题。搞什么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搞什么反典型化，只能破坏艺术规律，使小说变成身份不明的天外来客。

同志们、朋友们：欧阳老在创作实践和理论阐述中都十分重视典型人物形象的创造。他在《一代风流》这部巨著中，塑造了周炳、胡柳、胡杏、区桃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些人物的塑造达到了相当高度的典型化。书的头两卷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时候，就引起强烈的反响。相隔二十年之后，《一代风流》后三卷问世了。这部巨著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形象概括，是欧阳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我相信，研讨《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塑造问题，会深化我们对于艺术规律的认识，不但有助于总结过去，也有助于开拓未来，不但对广东的文学创作，也会对全国的文学创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希望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精神，就座谈会的论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又是富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我相信，在广东省各位领导的关怀下，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会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1995年12月13日

《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 斯 奋

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召开欧阳山同志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典型性格座谈会，这是我省文艺界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在此，我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座谈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欧阳山同志是我国著名作家，早在1924年，他就开始文学创作，并积极投身于进步的文化活动。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了约五十部三百多万字作品，其主要作品收入十卷本《欧阳山文集》中。他四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被誉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最早出现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长篇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国以后创作的五卷本长篇小说《一代风流》，更是以史诗式的恢宏构架，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革命斗争的长篇历史画卷，是我国描写现代革命斗争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奠定了欧阳山同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

典型问题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古今中外许许多多文学家们都以塑造典型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追求。特别是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更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五四”以后的我国新文学史上，许多老一辈文学家都对典型问题进行过很多有益的探索并有着良好的传统。欧阳山同志对典型问题非常重视，他在《〈欧阳山文集〉自序》说到，他

毕生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典型性格的问题，一个是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他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上对典型性格问题进行了富有真知灼见的探索和思考。长篇小说《一代风流》是他的典型观的充分体现，作品里面塑造了周炳、区桃、陈文雄、陈文婷等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典型性格，为我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

纵观欧阳山同志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始终坚持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和原则来表现生活，塑造典型。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觉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武装自己，指导自己深入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塑造典型。他的典型来自生活，并力图通过塑造文学作品中一系列典型形象，来表现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概括生活的现象，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塑造的典型形象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体现了他对塑造典型以及文学创作的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欧阳山同志在塑造典型、探索典型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好好地研究和总结。今年初，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要重点抓好长篇小说、电影和儿童文艺创作。长篇小说是我省文学创作相对薄弱的环节，认真研究和总结欧阳山同志塑造典型的宝贵经验，对于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任务，繁荣我省长篇小说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希望，我省的广大作家要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借鉴其成功经验，创作更多社会主义典型形象，推动我省小说创作的繁荣。

最后，祝愿欧阳山同志健康长寿。

《一代风流》与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

陈 涌

欧阳山同志的《一代风流》，表现现代中国革命的几个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并以此为轴心，刻画、描摹各个阶级，各种人物的离合、际遇，以及历史为他们注定不同的归宿。这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作者自己说，是受到 194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启示，才开始酝酿这部小说的，他起先设定的标题叫《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个看来似乎过于理性化的标题，正可以使我们窥见作者艺术构思的意向。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像这样深远的创作意图，这样规模宏大的创作成果，在这部作品出现以前还少见。

现代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但在文学上过去还没有得到稍具规模的艺术表现。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虽然还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也毕竟是 1924 至 1927 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很大程度的现实的真实的表现。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的革命斗争，由于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建立了革命政权地区人为的隔离，这个时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土地革命斗争，可说基本上没有得到相称的艺术表现。这种情况，可责怪的当然不是我们的作家。抗日战争，毛泽东正确地肯定是它以前现代中国革命“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阶

段”(《青年运动的方向》)。正因为这样,尽管对抗日战争的许多方面,在文学上都有了真实的表现,也决不能说,对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文学创造的源泉已经不需要我们继续开发。不能说,以现代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为表现对象的《一代风流》是这方面创作的结束,而应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而且获得重要成就的开端。尽管这部作品也有它的弱点,也常常令人发现明显的瑕瑜互见,但瑕不掩瑜,应该认为是一部内容深厚的、有重要的历史内容,又有无可置疑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性的作品,它理应归入现代中国里程碑式的艺术创作的行列。

这部表现现代中国革命全过程的作品,并不是主要着眼表现现代中国革命见于史册的重大事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更需要的是,从作家自己感受到、体察到的具体生活着手,而不能主要依据理性认识到的生活,不能主要靠从书刊或调查访问得来的知识从事创作。作家从具体、个别见出普遍和一般,还是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上的普遍和一般,然后寻找具体个别的人物、事件等等去加以证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方法。而且应该说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艺术方法。中国和外国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前面这种方法,才真正符合艺术规律,才能保证走向正确的艺术道路。

家庭、家族,是过去中国社会的细胞组织,解剖一些典型的家庭、家族,便可以使我们认清中国旧社会的真正面貌。这方面十八世纪中叶曹雪芹的《红楼梦》给了我们一个成功的典范。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的细胞组织使我们更真切地看清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果说《一代风流》也受到过《红楼梦》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积极意义首先就在这方面。

三家巷里周、陈、何三家祖辈父辈都是平民,但后来父辈周铁、陈万利,分别和杨家的两个女儿结婚,这之后三家便逐渐发

生分化，陈家成了倒卖物资和黄金的投机商，何家成了官僚地主，而周家却始终是打铁的手工业者。但这三家的第三代，本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都有爱国和民主的要求，曾经有过山盟海誓，拜把换帖，把希望寄托在光明的未来，决心共同开辟青年自己的事业。但不同的家庭关系和不同的社会关系，使他们后来也发生阶级分化是很自然的。这样，一面是姻亲关系，一面是阶级关系，这两种关系互相交错，形成这三家关系异常复杂的景观。姻亲关系使他们有割不断的联系，而阶级关系又使他们经常出现分歧、齟齬和矛盾。这种复杂的关系，更鲜明更突出地在这三家第三代的青年中展开。他们后来有的高升，完全抛开了先前的誓言；有的兴办实业，幻想劳资合作；也有的走向革命，但走向革命的所经历的道路也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其中工人家庭出身的周炳很快便成为一个坚实的革命者，而何家的何守礼，和国民党军官张子豪结婚的周炳的表姐陈文英所生的张纪文、张纪贤等等，虽然也和周炳一样到了革命根据地的延安，但他们的成为真正“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的革命者却还需要经历比较曲折的道路。这部历经整个现代中国革命的过程多卷本的长篇，是以这周、陈、何三家加上和他们交往的一些人的相互关系和他们的变迁来实现作者的意图的，这周、陈、何三家恰好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缩影。

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表现现实关系。这三家具体细微地体现了中国城市的几个主要阶级，他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成了交织着姻亲关系的阶级关系。可以认为，真实地表现了这三家，也就可能达到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关系，因此也可能达到艺术的现实主义。

作者差不多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同龄人，现代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他都亲身参加过，至少也是一个目击者。这部长篇也得

到证实,作者的生活经验是多方面的,从上层的官僚地主、资产者到下层各种不同的贫苦人民,他都有过深入的观察,深刻的体验,而且,他又是在走过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之后,才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巨著的,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他一生经验的一个艺术总结。无论他的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都使人相信他能很好地实现他的意图,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经过近三十年努力的创作成果,也证实了这点。

二

典型问题,是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可以说,在《一代风流》这部作品里,对人物的表现大都是出色的。他的几个主要人物,周炳、区桃、胡杏、何守礼,都是真实的,有典型性的,他的一些次要人物,以至一些着墨不多的,如陈文婷、陈文英、周泉等等,也都各有特色,给人难忘的印象。

但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周炳。重要的不只是这个典型人物贯串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成了这部篇幅不为不大的小说的骨干;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典型人物在艺术上的成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的典型问题。

这部长篇的第一部出版于1959年。在那些年月里,文艺上“左”的思想正在盛行,公式主义正在泛滥,现实主义成了一个陌生的辞语。当然,我们是有一些作家,特别是一些在生活和艺术的根基都深厚的作家,在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给读者带来真实可读的作品,但也改变不了当时“左”的思想发展的趋向。

在艺术理论问题上,典型问题在当时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相反的,把典型性和阶级性等同的看法,在五、六十年代有广泛影响,以至有些作家写出来的人物,令人怀疑是按照土地改革的

手册《怎样分析阶级》演绎出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時候，《三家巷》出来了：人们看到，主要人物周炳，不但不像当时大家容易习惯的英雄，而且也不像只读过一点书的手工业者。他憨直，不能容忍在他面前出现的邪恶的现象，这和他的出身，他的环境是比较调和的。但他又耽于幻想，痴情，而且也为许多少女所爱，这就有点像贾宝玉。但这个人物毕竟是有阶级倾向的，应该说这个手工业出身的小知识者，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的憨直，走直道也和他这个特点相联系，但一方面，它又和中国过去真诚正直的道德传统相联系，另一方面，这种憨直，走直道，也是他个人的气质、性格的特点相联系的。以上这些情况，就使我们看到，典型性格的形成的多方面的因素。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向会诱发与之相反的偏向，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在文艺问题上也是这样。对典型的、阶级性问题，简单庸俗的不符合实际的理解，以至把典型性等同于阶级性，这种观点使得文艺脱离生活，极大地妨碍文艺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造成典型的贫乏。批判、纠正这类简单庸俗的观点是必要的，有利于对典型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创作走向健全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否认典型和阶级思想的联系这类观点。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人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会承认的，但也有些同志承认人的阶级性，却认为文学的典型，至少有一部分只是一种人性的概括，只是一种一般“性格”的表现，似乎典型和现实生活中人的阶级性是可以分离的。似乎典型性格，至少其中一部分经过高度概括的典型性格，可以完全不是它产生的时代的特定的阶级性的表现，可以完全不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力量本质的表现。这类经过高度概括的典型，是各个时代都同样存在

的,经过作家高度概括的典型不可能是阶级的典型。例子首先而且主要是举出阿 Q。

典型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问题,看来的确需要更认真地分析研究,不能一概而论。但如果我们讨论的典型是指文学上的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而不是泛指艺术上的典型现象,那么典型的本质问题就不能离开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但人的本质这个问题,历来是存在着基本观点的分歧的。

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阶级性是人的最本质的特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到,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就都是典型人物,只要如实地对他们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来,也就可以成为文学的典型。如果承认文学不能凭空创造,也应该承认文学的典型不能离开人的阶级特点,应该承认文学的典型性不能离开人的阶级性。

文学上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是阶级特点比较直接的表现:巴尔扎克的爱财如命的葛朗台,果戈里的吝啬鬼泼留希金,曹雪芹的正统封建家长式的正人君子贾政,还有,对自己的阶级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的贾敬,荒淫腐朽的贾赦,欧阳山《一代风流》里的陈万利和何应元也属于这类。这些人物大都表现了各自阶级某个方面的特性,而且往往很突出鲜明。他们的典型性和他们的阶级性是一致的,对他们也比较容易理解,很少引起不同意见的分歧的。

阿 Q 的典型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就比较棘手,便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在阿 Q 精神反映了特定社会阶级的本质呢?或者它不是属于任何特定阶级,而只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一种没有阶级含义的“国民性”呢?

在中国历史上无疑也有过类似阿 Q 精神这种现象,甚至直到现在,小孩子受了欺侮无力反抗,有时也会以解嘲的方法来自

我安慰,使自己得到暂时的内心平衡。能不能用这种现象,这种方法来论证阿 Q 精神本质上是超历史超阶级的一般人性或“国民性”的表现呢?

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来观察阿 Q 精神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有过三四千年的历史,寿命之长,是世界上罕见的。无论经过多少战乱,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没有能根本改变中国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原因就在于没有能改变中国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是这种自然经济使中国封建社会保存了几千年的真正的基础。但这个基础终于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为外国闯进来的侵略者破坏了。中国的“天朝”抵御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洋枪洋炮,中国的手纺车、手织机、独轮车也抵御不了外国的蒸汽机。外国资本主义破坏了中国中世纪的平静。自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几千年来未有过的令人震惊和惶恐不安的骤变。有过自己繁荣昌盛的光荣的历史,一向盲目自大,对西方只知道蔑视的中国封建阶级,是不能理解这个翻天覆地的骤变的。但中国封建阶级走向没落,不可能再有更好的命运是注定的了。他们只能以缅怀过去的光荣来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他们用精神的胜利来掩饰自己实际的失败,所谓阿 Q 精神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和泛滥起来的。这首先是走向没落和衰亡的中国封建阶级的思想,但它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成为在我们中国社会里普遍的思想,成为一种鲁迅所说的“国民性”。

阿 Q 精神当然不是通常阶级性的表现,不是通常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阶级的要求、愿望的表现。这是一种人的本质被扭曲了的病态的症状,而且阿 Q 精神在中国确实并不只是个别阶级的症状,它在过去中国已经成了广泛存在的“国民

性”，但它的产生并不是和物质生活条件无关，它的产生和扩展不是没有社会的阶级的根源的。只有把这种精神症状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和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的状况联系起来观察，才有可能对它有真正确切的客观的理解。

阿 Q 精神在走向没落衰亡的近代中国封建阶级那里得到最确切、最典型的表现。这个阶级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他本来就是盲目的民族自大的典型代表，到头又成了自轻自贱的阿 Q 精神的标本，而且这个阶级也注定只能带着这种自欺欺人的阿 Q 精神走向坟墓。但对普通人民来说，阿 Q 精神是一种还没有认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真正出路的表现。如果说，对于例如破产的小生产者，在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真正的出路时，也有产生阿 Q 精神的内在的根据，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三

典型性不能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典型性格不都是阶级性格，问题在这里要复杂得多。典型性格，在更多时候，既是阶级的，同时又不能不和人的一般本性相联系。马克思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有它的人类学的前提，但人的一般本性无疑不是自然性，而是一种社会性。人自从脱离狭义的动物界成为人那时候开始，便是社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人的一般本性指的是什么呢？怎么才算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呢？这个问题看来可以和恩格斯关于人的